

机不可失的教训

——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再认识

· 金怡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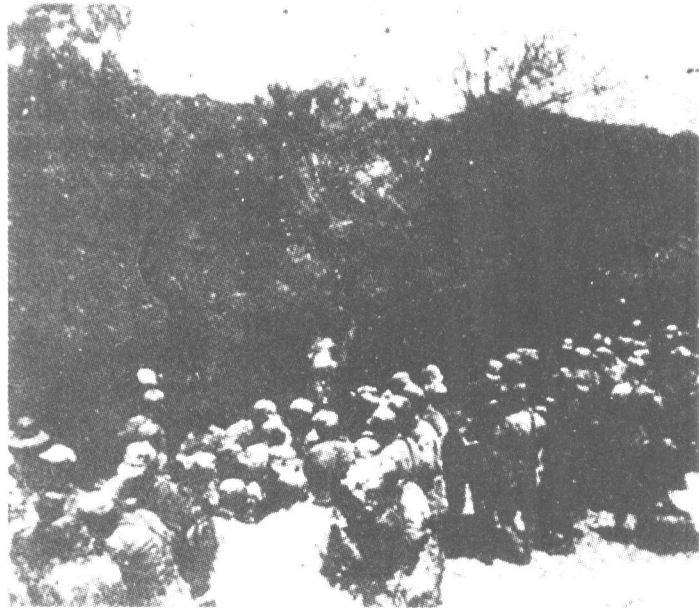
皖南事变后，不少人对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人所引导的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提出质疑。笔者试从当时的现实条件出发，就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1940年10月国民党当局发出皓电，强令江南（包括苏南、皖南）所有新四军部队限期北移。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于11月初作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至长江以北的决定。至11月中旬，经叶挺与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谈判，顾祝同同意皖南新四军经苏南移苏北，并具体指定了路线。此后，皖南新四军即在路线沿途设立兵站。自12月初开始，部分非战斗人员近两千人及大量军事物资在顽军严密监视下，分两批经指定路线进入苏南。就在我第三批人员即将转移时，蒋介石却下达了新的指令，于12月10日密令顾祝同：“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蒋介石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1940年10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向我苏北新四军进攻时，“黄桥决战”迫使国民党让出一席之地给我苏北新四军。苏北新四军现已站稳了脚跟，蒋唯恐江南新四军过江与苏北新四军汇合后队伍更加壮大，对韩部构成更大威胁。12月中旬，顾祝同根据蒋的命令，下令皖南新四军改道由铜陵、繁昌间北渡。

为了顾全大局，新四军军部尊重了战区司令官的命令，并于12月27日晚电告了中共中央，中央于12月29日复电：同意新四军军部报称的“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

自铜陵、繁昌之间渡江至皖东的无为，这条路线的利处，一是路线短并且熟悉，如果傍晚由驻地出发，次日拂晓就可抵达铜、繁间沿江，白天稍事休息，晚上就可过江；二是这段长江两岸都是我方活动的地区，北岸是孙仲德游击队活动区，过江后有队伍接应，南岸是我三支队活动区，给养不成问题；三是群众条件好，部队活动容易保密。项英也看好了这条路线。1940年11月，军部就

派人侦察北渡路线，后又派遣一个200余人的渡江筹备组，去江北筹集船只。三支队在皖南的部队也在繁昌西南水龙山、张家口山、蝌蚪山一线，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为大部分队伍过江做准备工作。但国民党顽固派也在积极策划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何应钦、白崇禧在下令皖南新四军由铜、繁间渡江的同时，对外公开宣称新四军将渡江北上，“故意泄漏这一军事秘密，以致日伪军在铜、繁之间据点星罗棋布，将沿江要口严加封锁，巡逻艇昼夜逡巡于江面上”；何、白还密令国民党皖省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调三个师的兵力驻在庐江、无为一带，配合日伪军阻挠我军北渡，并且李品仙将我军待以



渡江而筹集的几百条大船扣留，扬言新四军一过江便打。蒋介石本想趁我军在繁昌、铜陵北渡之际，实行南阻北打，南面借日伪之力，北面调李品仙三个师，企图制造第二个‘湘江战役’。”（见傅秋涛：《新一支队突围》）。当我驻重庆办事处获悉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后，即发出警报，提出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12月30日，毛泽东指示叶、项：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以“分批走苏南为好”。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经过权衡，临时决定放弃整装待发的分批渡江北移部署，仍改由苏南渡江。12月31日电告华中指挥部：1月4日决心东移。1941年1月1日又电告毛泽东：“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定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到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1月3日，毛泽东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赴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由上述过程而知，由铜、繁渡江北移路线，实际上是为顾祝同一伙顽固派所“扼杀”，放弃这条路线并非项英等人的主观意愿，乃是迫于当时日顽的军事形势。

进入苏南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条为东线，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经过马头镇、杨柳浦、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原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至苏北。此线的直接距离较短，沿途设过兵站，与苏南部队接近，易于策应。沿线还设有民运工作组，群众基础好。早在1940年春，新四军军部按第三战区令拟迁往苏皖边境时，曾派李志高、扬帆率领“参谋旅行团”侦察沿线地形、制定过转移方案，而且此线原为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合法”路线，我第一批、第二批非战斗人员及大批物资都是顺利通过这条路线到达苏

北的。但是，这个方向却是顽方围堵皖南新四军的重点地段，沿途有五十二师、一〇八师两个师的兵力，沿围堵线有永久性工事对我。另外，沿途河流宽深，不能徒步，地形甚为不利，如我被围，将处于不利地位，不易突围。尤其是蒋、顾下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后，已不再允许我大部队通过，如我强行通过，同样会遭到拦阻。并且苏南一带又地处平原，敌方据点林立，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为华中敌伪统治的中心地带，我大部队活动，缺乏回旋余地，不易立足。此时，在苏南主持工作的谭震林也来电称：敌伪为配合顽方行动，正在苏南进行“扫荡”，情况至为紧张。我此前几批人员进入苏南后，即被迫换穿便衣，化装分散通过封锁线前往苏北。

另一条为南线。这条线路是自云岭往南经茂林向东折向星潭，再经过三溪、旌德、宁国等地迂回入苏南待机北渡。1941年初，顽四十师一部始进驻星潭一带。当时考虑到走此路线可脱离顽五十二师、一〇八师，虽有与顽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估计以我六个团之兵力对付顽方一个师，至少从数量上是占优势的。从地形上看，茂林至星潭要翻山越岭，走崎岖小路也较隐蔽，如能进入天目山北麓苏皖边境地区，也有利于我大部队的隐蔽与机动。此外，在新四军军部决定放弃铜、繁北移路线后，“叶挺军长又到上饶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提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郎溪，并以人格担保允于沿途保护。”（见《叶超回忆录》）。叶挺军长还从上饶带回部分积久的经费、子弹，顾祝同承诺到宁国再加发。走此线的不利因素是仓猝决定改道，来不及进一步了解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和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对顽四十师的装备及战斗力状况不明。实际上，崇山峻岭不但道路难行，增添人员的疲惫与横向通

讯联络的困难，而且遇有情况还不易展开兵力与协同作战。特别是如不能迅速占领星潭，突过徽水河，将会陷入孤军深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新四军军分会经过讨论，认为，日伪严防铜繁，苏南兵力必将相对空虚，沿此线进苏南又是顾祝同刚同意的“合法”路线，沿途多崇山峻岭，便于我军隐蔽行军。而且一出旌德，顽军欲拦阻也难得逞，现又造成明从铜、繁渡江，实是向苏南转移的态势，以项英的话说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项英等人经过权衡，坚持选择这条去苏南的路线。1月4日，部队及军部便从驻地沿此线开始向苏南转移。

由上可知，去苏南的这两条路线虽各有利弊，但同样需要艰苦的战斗才能突围，绝无侥幸之余地。国民党要铲除皖南新四军这支红色的革命力量是早有决心和预谋的，在大包围圈已形成的情况下，很难测定走哪条路线就一定安全。项英等人选择后来的这条路线，一定意义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新四军转移途中遭受的惨重损失，其直接原因主要不在于选择的路线是否得当，而在于错过了有利的转移时机。1940年10月国民党皓电发出后，中央几次电催项英速作决断，将江南新四军迅速转移至江北，但项英迟迟下不了决心，一拖再拖，致使国民党包围圈逐步形成。转移前夕，项英若抓紧时机，趁顽军40师进驻星潭一带之前一举突围，也是有成功希望的，如同李一氓所说：“其实决心大，早走三天，也许就冲出去了。”可惜未能这样。还值得一提的是，皖南新四军上下不少人对国民党存有幻想，认为即使打仗，也不过是小规模磨擦，而不会清剿，从而导致在转移途中未能做好随时应付大规模突袭的精神准备。战事后，1月11日，叶挺军长还打了两份电报，一份给蒋介石，一份给顾祝同，希顾另指路线让新四军渡江。岂不知蒋早已密令：“一网打尽，生擒叶项！”○